郑州日报
ZHENGZHOUDAILY

精品文摘

■ 名流故事 17版 ■
■ 生活·男女 18版 ■
■ 史海·美文 19版 ■
■ 世态·开心 20版 ■

2007年5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芬兰：用家庭教育赢过世界

家庭教育责任重大

芬兰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中，芬兰已经不只一次登上最佳学校教育冠军的宝座。2003年，在受调查的四十一个国家的中学生中，芬兰学生的阅读、逻辑、数学与自然科学能力，都是一流，芬兰的教育也成了各国效仿、研究的对象。

芬兰赋予家庭相当大的教育责任。首先，芬兰的孩子七岁才入学，在这之前，虽然父母可以把孩子送到照护中心或学前班，但不可讳言地，家庭要负起主要的教育责任。例如，培养小孩的阅读能力、学习兴趣。芬兰的图书馆与博物馆都有为学龄前儿童设计的活动，一向安静的博物馆中也有许多父母推着娃娃车、带孩子去参观，还在襁褓中或正在学步的小孩。

另外，芬兰教育部的报告指出，芬兰父母从小就有在家阅读、念报给孩子听的习惯，让孩子在家中种下喜欢阅读的种子。有40%的学生指出，阅读是他们最喜欢的休闲活动。

芬兰父母的教育观念，也相当值得学习——虽然他们从小就教孩子们读书，但却不把学业当成唯一。在寒暑假里，他们不送小孩去补习英文、数学，而是为孩子安排各种学习生活技能、户外旅游、或是游泳、滑雪、运动的夏令营等活动。

政府聘父母当保姆

芬兰政府愿意花钱投资教育。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反而增加教育、研发等经费，希望藉此投资未来，挽救经济。所以，小孩出生以后，就能领到儿童福利金、未成年生活补助等等福利。其中，有些部分还限定要用作文化、教育用途，政府把津贴转入每个人的特定账户，这个账户的金融卡只能在与政府签约的书店、美术馆等教育文化单位才能消费。

芬兰也有鼓励家长照顾孩子的制度。例如，他们发给家长照顾儿童的津贴，仿佛父母都是政府聘用的保姆。母亲的有薪产假长达4个月，父母也都能申请育婴假长达半年，同时可领到60%的薪水。

除了有形的金钱补贴，政府也提供种种服务。例如，如果父母要上班，则有日间托育服务，政府会提供补助，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地拼经济。学童下课后，学校也有特别的地方让他们写作业或玩耍，而且还安排教师从旁协助、照顾，父母不用费心、花钱给孩子上“兴趣班”。

图书馆服务周到

在许多关于芬兰教育的研究报告中，都提到图书馆。芬兰有1000多个图书馆，平均每250人就有一个图书馆，比例之高，堪称世界之最。

芬兰图书馆的服务也很周到。例如，偏远的地区如果离图书馆较远，有流动图书馆每周到农村的学校巡回送书。如果有借不到、找不到的书，图书馆也会从别的分馆调来，满足大家的求知欲。

摘自《海外星云》

智力能测量吗

智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糟糕的衡量智力的手段。能否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解释人类为什么更聪明？

认为智力是固定不变而且100%可遗传的智力理论史不怎么令人称道。这些理论一直被用来证明很多事情，从奴隶制度，到优生学家让智力低下的女性绝育。

虽然学术文选中仍然使用智商测试和一种固定的一般智力的概念，但是它们仍然带有一些恶名。现代理论往往更注重各个种类的“智力”。

很多人反对继续使用智商测试的方法。智商测试通常包括语言、空间和数字推理问题。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不能用智商测试来衡量智力，但是他们依据的理论却各不相同。

在美国，事实曾经证明，智商类测试可以成功预测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成绩。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就开始呼吁更有建设性的想法了。而且，事实证明，智商测试在预测一个人的一生是否成功这方面也不准。

智力与遗传

不过，虽然大多数人不认可智商完全可以遗传的想法，但是收养研究表明，人类的智力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取决于生身父母的能力。

科罗拉多收养项目的研究人员约翰·德弗里斯发现，被收养的儿童和他们的生身父母在认知能力上有着很强的联系。人的认知能力在3岁到16岁之间急剧增长。德弗里斯还发现，被收养的16岁的青少年的智商与其养父母的智商没有关系。精神病学副教授伯尼·德夫林对212项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在对智商分数产生的影响当中，遗传占48%，产前护理占20%，环境和偶然性占32%。就智力而言，目前认为基因和环境都对智力有影响。

多个研究显示，改变环境会影响贫困儿童的智商分数。研究发现，让贫困儿童服用维生素和矿物质三个月，他们的智商分数提高了4个百分点。如果有一位爱说话的母亲，儿童的智商分数平均能提高6到7个百分点。

当然，这些研究仍然用智商来衡量智力。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有各种各样、相互独立的智力，一些人在其中一些智力上会高人一筹。他认为智力包括语言、逻辑与数学、空间、身体与运动感觉(他举例说大卫·贝克汉姆就是一个身体与运动感觉方面的天才)。有人认为“身体与运动感觉”和“逻辑与数学”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加德纳认为，应该根据社会的价值观来决定把什么视为智力。

智力与大脑

还有些人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研究智力。神经生物学家约翰·罗德尔等发现了一种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智能”酶——Src。Src可以激发神经通路的建立，而神经通路能帮助存储和传输信息。根据上述发现，他们预测提高智力的药品的问世并非遥不可及。

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也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了智力。他分别衡量了高智商者与低智商者的反应时间、检查时间和脑波类型。高智商者对复杂刺激的反应更快、更一致。面对不熟悉的任务，高智商者比低智商者的大脑活动也更多。但是对于熟悉的任务，反应却是相反的。

在爱因斯坦死后对他的研究发现，虽然爱因斯坦的大脑在大小上属于平均范围之内，但是在爱因斯坦的大脑中，关系到数学、视觉和空间思维的大脑下顶叶比普通人多达15%，而且属于特殊类型。这表明，某种能力可能与大脑某个特定区域的大小和结构有关。

何谓天才

人们在什么时候会认为一个孩子有天才？这取决于所依据的智力理论。采用霍华德·加德纳的理论的人可能会认为，在加德纳提出的几种智力中，如果在其中一方面表现出色，就算是天才。但是，人们还是最常使用智商来衡量天才。

在智商领域中，100为平均值；美国认为智商在130至150的儿童比较有天才。非常有天才的智商约为180。哈佛大学的教育学家埃伦·温纳认为，使这一小部分非常有天才的儿童与其他儿童区分开来的是两种因素：一是掌握一个学科的本能冲动；二是在独立的突破性思维中，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记忆。但是非常有天才的儿童长大后不一定都出类拔萃，当然也不可能都成为天才。上述情况可能可以证明，智商所衡量的能力很有限。

至于天才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创造出来的，也存在争论。迈克尔·豪教授认为，人们夸大了遗传的作用。他的研究认为，勤奋、决心、积极性和专注是重要的因素。

其他研究人员指出，天才的音乐家、运动员和外科医生投入超强度练习。这种练习使某种技能成为第二天性，因此有人就可能精通某种技能。天才基本上局限于一种技能，这符合加德纳认为存在多种相互独立的智力这一观点。

摘自《参考消息》

共商“国”是

前段时间出现了一阵“汉服”热，苏锡常沪等地区据说还涌现出了一批“汉服爱好者”，那些红男绿女们身着古装戏里常见的那种宽袖长袍出现在闹市街头，向市民宣讲“汉服”，启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乘两会的东风，现在又有人想把他们心目中的“汉服”升格为“国服”了。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在此次两会上，就明确提出了这一建议。

“国服”这种说法其实有点搞笑。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西装，大体上只有便服、常服、礼服之分，没听说过哪个国家把他们场面上通行的服饰正式确定为“国服”的，最多被政府或大公司的礼仪部门指定为“官方服装”而已。“国服”和“官服”可不完全是一码事，后者不过系公务人员的工作服而已；而前者却含有一种类意识形态的权力强化意义。以前有人称“中山装”为中国“国服”，此说其实更可乐。所谓“中山装”实际上就是西方几十年前最常见的军装而已，不过是欧洲宫廷制服的改良品种，怎么就成中国的“国服”了呢？而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就引进“胡服骑射”了，你能说那“胡服”是“中装”吗？

近期被大炒特炒的，不光是“国服”，还有所谓“国山”、“国花”。有一种已持续了好长时间的争论叫“国花之争”。有人建议将笑傲霜雪的梅花确定为“国花”，有人则认为华贵雍容的牡丹才是当然的“国花”。享有“梅花院士”美誉的90高龄之工程院皖籍院士陈俊愉却表示：“双国花”最能体现社会和谐。如果这个逻辑行得通，那么依我看，确定五十六朵“国花”，更能体现中国这个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的社会大和谐。

其实，定哪个为“国花”，或者需不需要定“双国花”，都是可以讨论的。已经有102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关于尽早确定梅花牡丹为我国国花的倡议书》上签了名。这说明“双国花”提议受到强有力的支持。关键是，再好的建议，假如掺杂了地方利益之争，就变得暧昧起来。所以，凡跟“国”字沾边的，还是交由全体国民投票确定为好。

同样掺杂着地方利益的，还有“国山之争”。来自山东省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要求确立泰山为“国山”；而来自安徽省的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即便国家要立“国山”，黄山也应在考虑之列。敢情，也要搞出个“双国山”不成？可说不定这“一国两山”也搁不平啊。除了“五岳”之外，中国不是还有佛教“四大名山”吗？台湾还有阿里山，东北还有长白山……对了，难道西藏自治区境内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就没资格参与“国山”角逐？

与“国”字沾边而近来又被热议的，还有“国骂”。中央文明办表示，将要发起一场拒绝“国骂”的活动，主要针对的是赛场上的不文明行为。在政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如何文明办奥运”成为委员们谈论的重点。他们表示，要改变开口就是“国骂”、“京骂”之类有辱国格的现象。这很有必要。

摘自《中国青年报》

生物入侵者：下一场瘟疫

又大又肥又丑陋的蜗牛，恐怕哪个人也不愿养来当宠物，尤其是在眼下蜗牛成患的巴西。这种巨型蜗牛19年前从非洲老家来到巴西，巴西人本来以为找到了一种便宜的美味佳肴。不过显然蜗牛的命运并没有因此变得悲惨，实际上，这个美好的初衷最终成了一场噩梦。蜗牛在这里能长到人拳头那么大，重达1公斤，每年产2000只卵，每天吃重达自身体重1/10的食物——从细菌到树木，从蚊子到猫鼬，不一而足。这些入侵者在家乡时，自有其天敌，在生物链中乖乖扮演着自己应有的角色。可一旦换个环境，没了天敌，那它们玩命地疯长，甚至因而打压当地的其他物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要说这些外来移民一点好事没干，那也是不客观的。

事实上，在大米、玉米等主要农作物中，有90%以上对于种植地来说都是外来物种，它们对人类的生存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专家指出，在非洲地区，一旦引入在它们看来都是美味。巴西人吃蜗牛的速度能否赶上蜗牛繁殖的速度且不说，最可怕的是，这种蜗牛能够携带老鼠身上的寄生虫，人一旦食用未消毒干净的蜗牛，寄生虫就会进入人脑，并引起脑膜炎。

巴西的遭遇决不是世界上独一家。实际上，这种从别处引进物种并对当地造成损害的情况，在生物学上叫生物入侵。这种入侵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愈演愈烈。就像有些学者所说，这恐怕就是全球化的代价。至于入侵者的种类，的农作物未能获得成功，它们不仅是变成大面积蔓延的荒草那么简单，一场饥荒是在劫难逃的。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由生物入侵引起的灾难呢？海关对旅游者及其携带物品、集装箱货物等进行严格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能做好把关工作，入侵者一旦进了门，处理起来可就难了。文章开头提到的蜗牛，如今在巴西27个州中的23个州安居乐业。尽管巴西政府已经对这些入侵者发出禁令，但是效果显然不太好。于是，政府又派出了民防队，想办法消灭这个可怕的入侵者。

摘自《北京科技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名流故事

季羡林是个怎样的人

读罢季羡林的新著《病榻杂记》，受益匪浅，感慨良多。这位九十多岁大学者的病榻之言，真是字字珠玑，句句箴言。其中有两点，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是，这位蜚声中外、万人景仰的大学者，竟然昭告天下，请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他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我自己被戴上这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季羡林是喜欢讲真话的人，而且是善解人意的人。不到不得已时，是不会说出这种让媒体或吹捧者下不来台的话的。其实许多年前季羡林就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因为他的学问根本就不是国学。但是没有人去听他的话，更没有人去翻阅一下他的著作，做一点调查研究工作，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6年前，2001年4月18日的《北京青年报》曾经登载过一次对他采访的消息，在采访中，他再次郑重声明：“我说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外面的消息你们只能相信60%就行了，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但是似乎都听不明白，可能有人还以为这是季羡林的谦逊之词呢，岂知季羡林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容不得哪怕半点不实之誉和溢美之词的“玷污”。他一看到这些虚幻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就会感到不“自由自在”，“浑身起鸡皮疙瘩”，好像戴上“荆冠”一样难受。所以，这一次他忍无可忍，把多年郁结心中的一股闷气说出来了，使全社会为之惊讶，使媒体为之震撼，使追名逐利之徒为之汗颜。季羡林这一义举，实在是对当下文坛浮躁之风敲响了一次警钟，注入了一针清醒剂。

其二，季羡林首次对自己的人品作出了评价。他在《在病中》一文中写道：“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好人，但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滥好人。”

这句评语看似平淡无奇，却十分耐人寻味。

先说说什么是“平平常常”。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学贯东西，博古通今，著作等身，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知名度。他还做过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还是50多个国家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可以说，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他是数一数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但是，季羡林从来就不觉得有了上面那一大堆头衔，那一大摞帽子就改变了自己平常人的身份。他不断地在文章里声称，自己是一个“胸无大志”，“普普通通”，“中不溜丢的人”，“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这是在“作秀”吗？不是。这就是季羡林的真实想法，是他平民情结的表现。

再说，在季羡林心里，怎样的人才算是“好人”呢？

他曾多次说过：“一个人除了为自己着想外，能为别人着想的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就算是一个好人。”这个标准，是高呢，还是低呢？仔细想一想，恐怕不能算低吧。如果人人都能为别人着想百分之六十，为自己着想百分之四十，天下岂不早已太平，国家岂不早就成了“君子国”，国人岂不早已成了桃花源中人。

季羡林在该文中又说：“我考虑别人的利益，为别人着想，我自认能达到百分之六十。我只能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这次季羡林不客气了，他当仁不让，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其实，了解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一事当前，他为别人着想，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

季羡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但“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滥好人”。他说：“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会一反谨小慎微的本性，挺身而出，完全不计个人利害。我觉得，这是我身上的亮点，颇值得骄傲的。”能证明这一优点的最好例子，便是季羡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挺身而出，反对那个执行极左路线，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虽然因此遭到抄家、批斗、劳改、踢打、关牛棚等等惨无人道的迫害，但季羡林从未屈服过，并以此为荣。

季羡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借用毛主席评价白求恩的话来评价季羡林是十分恰当的：“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摘自《中国青年报》

“大唐高僧”牵手“紫檀女王”

女富商陈丽华一向为人低调，但她人生的第二春却让她曾轰动一时。十几年前电视剧《西游记》家喻户晓，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在演艺的巅峰状态下却告别演艺圈，与年长他十余岁的陈丽华缔结婚姻。这种老妻少夫的爱情本身已经足够传奇的，尤其发生在女性首富的身上则更引人遐想。

《西游记》送来“迟到”丈夫

男主人公迟重瑞，十年前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唐僧的扮演者。十年前“妖见妖爱”的东土大唐高僧，在《西游记》播映后大红大紫的关头突然销声匿迹，再次出现时已摇身一变成了产业覆盖香港和大陆地区的成功商人，与夫人共同携手经营着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北京长安俱乐部、北京丽苑公寓和中国紫檀博物馆。这个童话就缘起于迟重瑞和长自己十多岁的陈丽华的结合。

“我和他原来不认识，是京剧院的朋友介绍认识的，我开始并不认同这个婚姻的想法，最终结婚也是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结果。”谈起与先生迟重瑞这段震撼传统的婚姻，陈丽华直言自己相信这是一种“缘分”——人与人之间最难说清楚的东西。

酷爱祖国文化的陈丽华是个超级京剧迷。1988年电视剧《西游记》火热播出的时候，有次刚好陈丽华到中国京剧院会客，而恰巧当时迟重瑞也在那里。京剧让两个人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而开始交往。迟重瑞出生于京剧世家，袁世海、张云溪都是他的姑夫。而迟重瑞也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新《西游记》中的插曲《看我跃马扬鞭》《晴空月儿明》都是他演唱的。尽管陈丽华比迟重瑞大十多岁，但迟重瑞并不在乎这些，1990年两人共结秦晋之好。

陈丽华对丈夫是这样评价的：“迟先生这个人特别好，不虚伪，说话也是慢条斯理，我管他叫‘迟到’。他这辈子净迟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就老迟到，到《西游记》剧组也是迟到，到上海戏剧学院都28岁了，38岁认识我才和我结婚，所以‘迟到’就成了迟先生的绰号。”

“唐僧夫妇”牵手西天取檀

陈丽华出生于京城皇族正黄旗世家，自幼便对家中珍藏的明清紫檀器具情有独钟。在“文革”期间举国大破“四旧”高潮的时候，独具慧眼的她就开始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紫檀器物。十多年前，当她感到再也无法用收集的方式来扩大和满足对紫檀家具的执著时，就利用在香港经商所得的巨资，从全国各地招来数百名木工以及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生产以紫檀家具为主的仿宫廷高档家具企业——北京富华家具企业有限公司。

在迟重瑞十多年的生意路上，他自己最得意的要数帮助夫人在北京创办“中国紫檀博物馆”了。陈丽华对紫檀木的爱可以用“疯狂”两字来形容。紫檀木树种极为稀少，百年才长1寸硬木，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异材”。而野生紫檀现在只有在印缅边境的热带森林中才能找到，每年迟重瑞与夫人都要去那里采购几次。在野兽出没、蟒蛇肆虐的原始森林，危险无处不在，陪伴陈丽华左右的迟重瑞再次找到当年赴“西天”求取“真经”的感觉。

几乎每天迟重瑞都陪伴陈丽华在紫檀工厂里。迟先生明白，他跟陈丽华的结合就意味着他与紫檀的结合。陈丽华则说：“我所建立的紫檀博物馆可是少不了迟重瑞的贡献。”

迟重瑞是凭借“唐僧”一举成名的，但1990年结婚移居香港后他就开始远离了演艺圈。陈丽华也很理解迟重瑞，当杨洁导演要补拍《西游记》续集时，陈丽华主动鼓励迟重瑞续演唐僧。有了陈丽华的支持，迟重瑞随即踏上去往云南拍摄现场的路途。没有自己的大奔驰，没有豪华房间，有的是睡通铺、挤面包车，时间整整一年。对于这次意外“出轨”，迟重瑞笑着说很感谢夫人对他的理解。

支持丈夫重返荧屏演高僧

2006年12月26日，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重点拍摄的剧目，电视剧《鉴真东渡》在北京紫檀博物馆举行了媒体见面会，主演迟重瑞携夫人、身家55亿的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同时也是这部戏的投资人陈丽华一起出席了见面会。在发布会现场，迟重瑞表示：“我和董事长这些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紫檀事业，现在国外很多大博物馆都收藏有我们的紫檀作品。人不能一心二用，以后能否再出来演戏，还得看剧本和时间。”陈丽华则表示，她很支持丈夫的演艺事业，如果以后有机会，他们还计划投资影视公司。

对于迟重瑞重返荧屏的出色表现，导演称赞迟重瑞从商多年后重新拍戏，依然吃苦耐劳，艺德高尚，尤其对鉴真晚年失明后的外形和内心都把握得很精当。迟重瑞则说，此次出山，还因为他本人是居士，“能够出演我国历史上的两位高僧大德也是我的福分，西去取经，东去传法，都是功德无量的事。”

从1988年相识，1990年共结秦晋之好，17年风风雨雨走过，两人的感情仍不变味。夫妇俩还在1992年皈依了佛门，佛家说五百年修来是朋友，千年才能修得夫妻共枕眠，这也许也是一种缘分吧。

摘自《新民晚报》

英女王口音更具“大众音色”

一项最新研究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目前不再操着一口高贵的“女王英语”对外发表讲话，而是逐渐具备了更多“社会阶层相对较低者”的口音——也就是所谓的“河口英语”(即伦敦音)。在英国，由于不同地域口音不同，英国人可以依据一个人的口音迅速辨认出对方的成长地乃至社会阶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去的口音类似牛津腔，是英国上流社会所说的“标准英语”。上述结论刊登在最新一期英国《语音学杂志》上。

德国慕尼黑大学语言学家哈林顿研究了伊丽莎白二世即位起50年来历次圣诞演说中的元音发音，结果发现，女王目前所讲英语的口音接近居住在英国南部的普通中层民众，并且同当地一些电台播音员的发音颇为类似。从1977年开始，语言学家发现女王的元音发音出现了细微改变，并且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日益明显。到2005年，女王原来那清晰、贵族式的发音已明显消失。研究人员指出，英国女王的发音变化相当缓慢，经历了很长时间演化才形成了现在的风格。此外，女王并非有意调整自己的口音，整个社会力量的变革很可能是引起女王乃至英国社会口音变化的潜移默化原因。毕竟，女王的英语受伦敦腔影响而发音改变，在50年前简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社会等级观念较重，不同口音代表不同阶层的人。而在60至70年代间，英国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社会阶层差别才变得不那么明显。尽管伊丽莎白二世现在的发音倾向于东南部普通民众的发音，但距离“纯正”的伦敦腔，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尽管女王本人可能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发音已有所变化，但她老人家曾多次提到王室一些年轻成员的口音变化。据说，女王对自己王室成员口音伦敦化趋势“完全持中立态度”，任其自由发展。

摘自《看世界》

侯宝林逗乐毛主席

侯宝林第一次为毛主席说相声，是1949年4月初。毛主席被逗笑了，说：“侯宝林是个语言学家。”以后毛主席移至中南海，工作之余常请侯宝林到住处说相声。劳累了请侯宝林说相声，烦躁了请侯宝林说相声，高兴了也请侯宝林说相声。说过一个段子之后，毛主席常常带头鼓掌，说：“侯先生，再来一个。”

办公厅的同志认真规定了侯宝林与毛主席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让毛主席仰头看他，造成颈椎疲劳；也不可太远，影响观看效果。每次演出之后，毛主席要与演员握手，办公厅的同志交待侯宝林，一定要掌握时机，不要让毛主席站起来，要看准时机，在毛主席欲起未起之际抢先一步，与毛主席握手道别。侯宝林对领袖充满感情，每次他做得都很圆满。

不能不说侯宝林在相声领域是奇才。旧段子很快说完了，为了使毛主席听的相声不重复，侯宝林开始搞创作，自编自演。要毛主席喜欢的相声，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含量，这很不容易。这就逼着侯宝林阅读大量古书作为养料。有一次他编了个调侃诗人的相声，讽刺腹中空空，又要附庸风雅的俗人。作诗曰：“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听着这前言不搭后语的“歪诗”，毛主席笑得弓下腰，半天直不起来。

摘自《新闻午报》